

白城地区东北抗联口述史

我所知道的白团起义

1932年(伪满大同元年),原洮辽镇守使张海鹏部的白团(因团长姓白而称)起义了。我(张淦)当时虽小,但他们打鬼子、杀汉奸,出布告的一幕幕情景,总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在洮安县伪公署任承审的我父亲,在旧历八月的一天傍晚匆匆回家,告诉我母亲,赶快离开这个家,说“现在形势很紧,叛军要进城了”,于是我们便趁黑搬到华北医院的陈锡猷医生家里。

后来听说,义军此举和附近的自卫团以及县公署的马队都联络好了。当时日本参事官高桥光雄没在县里,伪县长金文彬得知了这一情况,就在头一天晚上穿了厨师的衣服躲起来。

第二天黎明,大街上枪声四起,马蹄声、人们呼喊声,混成一片。街内,骑马的义军,多数穿便衣,戴着兰布臂章,有的还扛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在几家商店的门前,还挂出了国旗,迎风飘动,门前站着喜悦的人群,有的还燃放鞭炮,以示庆祝。

中街处的汇源涌烧锅是起义军的临时指挥部,那里人来人往,忙个不停。全城只有老万大楼里的日本守备队还负隅顽抗,义军正集中火力,打那里的敌人。

老万大楼顶上日本人架起了机枪,向街内开枪扫

射。无数的义军战士,有的靠短墙、巷口掩护,也有的爬到居民的屋顶上,向楼上打枪。后来听说在老万大楼内的日本守备队的士兵只有八九个人,可是他们凭据高楼,强大的火力,防守甚严,义军攻了很久时间,也靠不上去。

凌晨义军进城后,首先攻进了伪县公署,没遇到什么抵抗,也没有抓到伪县长和日本参事官,却将一贯媚日的伪县公署实业局的陈局长从家里拖出来,枪毙在伪县公署西南炮台的路上。陈局长叫陈景新,外名叫孙小胡子,地县公署内日本参事官高桥的亲信,他娶了一个日本老婆,人们都管他叫“二鬼子”。之后,义军打开了监狱,把里边关押的犯人全放了。在福丰达烧锅西边,有一家日本洋行,专门公开倒卖“白面”(海洛因)、鸦片等毒品,毒害中国人民。义军捣毁了这家店铺,并打死了这洋行里的日本人。

义军又通过陈锡猷医生,找到了我父亲张兴汉,写了“抗日救国义勇军司令部”的牌子,挂在汇源涌烧锅的大门上,又写了安民布告贴了出去。我父亲原在洮南法院任过书记官,写得一手好水笔字,义军曾动员他参加抗日,因他有疑虑没有参加。

午后一点左右,白城子火车站南响起了炮声和机枪声,那是驻守洮南的日军乘铁甲车来了。老万大楼里的

日本守备队没有消灭掉,火车站方向又响起了激烈的枪声。义军只好留下一部分兵力钳制西北方向日军守备队的火力,而将大部兵力转向车站,去打洮南来的援兵。

白城守备队的日本兵得知援兵已到,对义军进攻的火力,也更加猛烈了。义军武器不行,火力也很弱,此时处于腹背受敌,被动挨打的局面,最后只得退出城外。

后听说义军又在城外打了几仗,附近的日军又增援百人去围剿,义军不得已才撤走。后有人说义军去打游击击去了,又有人说被张海鹏投降了,还有的说失败后各奔他乡散伙了。

事后有人检举,日本参事官高桥便追问我父亲与义军的关系,我父亲交待了被迫写牌子、写布告的经过后,又禁闭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后来我母亲疏通翻译,才放回家。不久,就把我父亲调到南满安县去了。

(七十一)
(中共白城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B 白城记忆

俭朴,清正廉洁,直至生命的尽头。唐玄宗开元年间(713年—741年)正是大唐盛世,国家强盛,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社会上特别是官吏中厚葬成风,姚崇对这一风气极为反感。临终前他立下遗嘱,说自己一生知止、知足,并写了一篇《遗令戒子孙文》,要求薄葬。他是这么写的:“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何烦厚葬,使伤素业”“吾身亡后,可殓以常服,四时之衣,各一副而已”,并要求子孙后代“汝等身歿之后,亦教子孙,依吾此法。”

纵观姚崇留给后代的家风家训,他认为“与其浊富,宁比清贫”“冰壶是对,炯诚犹存;以此清白,遗其子孙”。他要求子孙后代事亲至孝,不图虚名;移孝为国,忠直任事;廉勤从政,以身作则;知止知足,不妄图富贵;不斤斤计较,预分田产;提倡薄葬,节俭持家;谨言慎行,惟德惟贤。姚崇的家风家训特色鲜明,没有高谈阔论,也没有庸俗空洞的说教,寓意深远而为后世传颂,世称“宰相家训”。

好家训泽被后世,姚崇的子孙把姚崇的家训和遗嘱,作为家族的“藩篱”,作为处世的“标准”,世代遵守,代代相传。他们大多忠于国家,为百姓做事,彰显了仁义之风。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姚崇的家风家训不仅成为其家族传承的道德规范,更是中华家训中的经典,愉悦着人们的情志、陶冶着人们的情操、感化着人们的心灵,散发出无穷的魅力,彰显出积极的现实意义。

当下,现实题材网络小说创作日益蓬勃。根据《2018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数据显示,网络文学平台发布的新作品中,现实题材占比达65%,同比增长24%。

不同于玄幻、仙侠题材,现实题材的网络小说贴近生活,容易引发情感共鸣。例如《欢乐颂》,讲述了家庭背景不同、性格各异的5个女孩,在上海打拼的故事,《橙红年代》反映了都市草根阶层的平凡生活。

改编影视剧是带火现实题材网络小说的重要途径。今年热播的现代家庭剧《都挺好》,改编自阿耐的同名网络小说,播出后收视率节节攀升,并引发全民热议家庭关系、养老等话题。这些年,现实题材网络小说《大江大河》《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等,都是成功改编影视剧的典范。影视剧的热播,大大提升了原作的关注度和销量。越来越多成功的改编,会形成业态的良性循环,带动网络作者更加关注现实题材创作。

政策引导也为现实题材网络小说创作添一把柴。早在2014年底,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关于推动网络文学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就将“引导网络文学创作植根现实生活”作为重点任务之一。中国作协年度中国网络小说排行榜,也对现实题材的网络文学创作进行优先扶持。

虽然现实题材需求旺盛,但质量上乘的作品并不多。怎样创作更具有时代特色的精品力作,依然需要破题。

我
看
我
说

现实题材走红网络小说

●李雨青

吉林大学成立东北抗联研究中心

新华社长春电(记者赵丹丹)

吉林大学东北抗联研究中心日前在长春揭牌。该中心将充分利用吉林大学区位优势、学科综合优势、人才汇聚优势,聚焦东北抗联研究理论和现实问题,为东北文化历史研究发展作出贡献。

东北抗日联军是党创建和领导的人民英雄武装,以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抗联将士,在东北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达14年的艰苦斗争,数万名抗联将士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伟大的东北抗联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是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科学院院士、吉林大学校长张希表示,吉林大学将依托东北

抗联研究中心不断深化对东北抗联历史、精神、文化的挖掘、研究、保护和传承,通过开展学术研究、承担科研项目、组织学术交流,弘扬东北抗联精神,探讨东北抗联精神的当代价值,将东北抗联精神薪火相传、代代相传。

据了解,该中心依托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聚集了一支20余人的学术团队,其中博士生导师6名,教授3名。同时,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吉林省档案馆均与吉林大学签订合作协议,共同加强东北抗联档案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研究。

吉林大学是东北地区唯一一所“985工程”“211工程”重点建设的教育部直属综合性大学,也是国家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姚崇：自筑“藩篱”传家风

●刘育章

在河南省三门峡市博物馆里,收藏有人称“救时宰相”的唐代名相姚崇亲书的“藩篱”碑碣。该碑碣长85厘米,宽53厘米,厚12厘米。右上题款“大唐开元三年”,左下题款“姚崇题”,中间楷书“藩篱”两个大字。这是时年六十五岁的姚崇在开元三年(715年)回陕州硤石故里时挥笔留下的,是目前全国唯一发现的姚崇手迹。

“藩篱”,《辞海》中的解释是用竹木编成的篱笆或围栅,比喻门户或屏障;《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篱笆,比喻对事物的限制。姚崇以“藩篱”为喻,要求后人无论是做人还是为官,都要知道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要崇尚气节、忠君爱国,做到公平、公正、诚信。

姚崇(651年—721年),字元之,唐朝陕州硤石(今三门

峡市陕县)人,五朝为官,三居相位,一生“以不贪为宝”“以廉慎为师”,勤劳职事,功勋卓著,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贤相,特别是为开创“开元盛世”立下了功劳而名留青史。

时人及后世之人对于姚崇的评价颇高。同为唐相的张说称赞姚崇“位为帝之四辅,才为国之六翮,言为代之轨物,行为人之师表”。宋代大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价道:“唐世贤相,前称房杜(房玄龄、杜如晦),后称姚宋(姚崇、宋璟),他人莫得比焉。”毛泽东在点评《新唐书·姚崇传》时赞扬姚崇为“大政治家、唯物论者”,他赞扬姚崇进谏唐玄宗的“十事要说”:“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

姚崇一生三次为相,地位很高,但是以身作则,生活

考古学探寻中国史前文化

●李新伟



石峁遗址外城东门。

如果说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初的主要目标是寻找中国文化起源,1949年后的中国史前考古学则将最宏大的学术目标确定为重建中国古史,即以考古学的方法论证,在史前时代,历史时期绵延至今的多民族统一中国之“雏形”已经出现,“多元一体”的基因和“分久必合”的大势已经形成。70年来,几代考古学者对此初心未改,矢志不渝。

中国史前文化的时空框架基本建立

1949年至1979年,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已达六七千处,中国史前文化的时空框架基本建立。

上世纪50年代,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发掘深化了对仰韶文化的认识;而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则全面揭露一处仰韶文化早期聚落,为社会组织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资料。1977年发现于河南新郑的裴李岗文化,是一处距今8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填补了仰韶文化之前的空白。

学术建设是在一系列重大发现的基础上展开的。

1954年,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尹达即指出:“这些新石器时

代的不同系统的文化,在一定条件下,就逐渐形成中国古代史上的不同地区不同部落的文化。”明确了史前时代的文化格局和历史时期多民族一体国家的联系。

80年代以前,当时确认的最早的史前文化——“磁山—裴李岗文化”等“前仰韶文化”仅见于黄河流域;历史时期黄河中下游又一直是大一统王朝的中心,因此,“黄河中下游中心”或“中原中心”模式成为构建中国史前基础的主导。1959年,考古学家安志敏即提出:“从新石器时代到金属时代,黄河中下游一直是古代文明的中心。……这种悠久的文化传统与不可分割的联系,奠定了中华民族古代历史的发展基础。”石兴邦和严文明等代表性学者有类似表述。此模式第一次依据丰富的考古资料切实探讨了史前文化格局和历史时期中国的联系,对“先进”的黄河中下游文化影响和维系四方的中心地位的强调,也树立起以考古资料论证史前文化“一体性”的范例。

整个中华文明起源呈满天星斗之势

1980年至1999年是重大考古发现密集呈现的20年,一次又一次刷新了我們对于中国史前时代社会发展程度的认识。

辽宁建平牛河梁遗址为红山文化的祭祀圣地,1983年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大型石砌祭坛,数处积石冢和一座“女神庙”,出土大量精美玉器和神像,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

1986年,考古学家在浙江余杭良渚第一次发掘到了高等级的反山墓地。它和瑶山墓地出土的琮、璜、璧、钺的玉器组合震惊了学界,揭开了良渚古国的面纱。

山西汾阴陶寺遗址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1978年至1984年揭露出高规格大型墓葬,随葬的彩绘蟠龙纹陶盆、玉器、鼗鼓等礼器所表现出的“礼制”和汇集四方物品的气度,引发了我们对古史记载中帝尧功业的推想。

这些发现为中国的史前基础的构建提供了更丰富的资料 and 更广阔的背景。

“中原”之外的重大发现将一个清楚的事实摆在中国考古学家面前:黄河中下游并非“一直是古代文明的中心”。周边地区“前仰韶”文化的发现更表明中国史前各文化区有自己相对独立、基本平行的发展道路。



石家河遗址出土玉器。



陶寺出土文字陶壶。



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陶器。

“多元”文化因密切交流而渐成“一体”

进入新世纪,重大发现仍迭出不穷。这包括牛河梁16地点大墓、安徽含山凌家滩大墓、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祭祀遗迹和瓮棺葬玉器、陶寺天文观测设施以及良渚城址和水利设施等已知遗址的新发现,也包括河南灵宝西坡仰韶文化中期大型房址和墓地以及江苏张家港市东山村桥泽文化墓地等新发现。

2011年以来,陕西神木石峁遗址更是公认的“石破天惊”的重大发现,气势磅礴的石城、新异的石雕、砌入墙中的玉器促使学界郑思考西北地区在中国文明形成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通过对诸多考古现象的观察,笔者认为,距今6000至5300年前后,中国史前各文化区不仅社会同步发展,地区间交流互动也进入新阶段。各地区新涌现的社会上层为维护自己的地位和威望,构建出一个社会上层交流网,以之为媒介的礼仪用品和高级知识的交流在考古中得到证明,促成了各地区一体化的进程。

各地区共享的原始宇宙观、天文历法、权力表达方式、丧葬和祭祀礼仪等均成为后世相关思想和制度的滥觞。区域间交流也促进了相关“共识”的形成,但各地区的社会复杂化进程各具特征:红山文化和凌家滩玉器反映出强烈的宗教取向;大汶口文化和崧泽文化随葬品丰富;西坡遗址反映的庙底沟社会则更注重大型公共建筑和墓葬规格,无奢华随葬品。这样的局面正如“满天星斗”。

中国史前区域文化的发展构成了日后中国古代文明的主要部分。经过70年的考古工作,史前各区系文化的主体日益明晰,这也是考古学家能够从物质文化中看出各区域文化交流或冲突的根本原因。经过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发展,中国各区系史前文化的面貌日渐显露出同一趋势,直到夏商周为主体的中国古代文明兴起之后,才逐渐改变。夏商周三代文明像一个滚动的雪球,越聚越大,文化的同一性也空前加强,最终为秦汉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